

思考婦女／性別史與世界／全球史： 交集、張力與機會*

烏爾麗克·史特拉瑟(Ulrike Strasser)**著
陳恬緣譯，陳韋聿校閱

世界／全球史、婦女／性別史這兩個歷史研究領域，談論的是連結關係越趨緊密的 21 世紀世界當中，一些最迫切的議題：權力如何被全球性地分配並跨越邊界地運作；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如何利用和共享地球的環境資源；出現在世界上某一地區的病原體如何對其他地區造成影響（儘管經常是

* 這篇評論文章改寫自 2019 年夏季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的「性別視角下的全球史」(Engendering World History)研究生研習營的主題演講。由於該演講旨在為研習營提供一個共享的架構並激發討論，並不打算做全面性的綜述，而是試圖指出關鍵的問題和文獻，以便進一步研究和應用於具體的研究計畫。在這個版本中，我刪減了研習營上提供的一些歷史實例。感謝法蘭克·比埃斯(Frank Biess)有益的回饋，也感謝學生們在研習營上的熱烈討論。

**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

以極為不同的方式)；以及商品的生產和交易如何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和機會，卻使得貧困和不平等的結構更形惡化。在這些議題面前，我們的身分不僅只是某個社群（可能是政治的、國家的、國際的、宗教的、文化的、民族的）的其中一個成員——那意味著我們必須與其他成員之間發生合作、競爭、衝突等等的連結關係，我們所有人更是作為性別化的個體在面對這些議題。即使性別的具體輪廓因地而異，在全世界的各種人類社群當中，它仍是一項社會原則。

世界／全球史家以及婦女／性別史家已經產出了大量研究，有助於照見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背後，埋藏著什麼樣的深層歷史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如何歷史性地影響了群體和個體。然而，事實證明：要使全球史和性別史發生持續的對話，產生一種結合兩者長處的學術成果是相當困難的。在下文中，我意圖描繪這兩個領域之間的交集和張力，進而探討有什麼樣的建議和可能性能夠幫助我們更充分地整合這兩種歷史學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我是站在一個特別的學術立場來處理這個課題。我最初在德國接受過歐洲史方面的培訓，後來則前往美國繼續讀研究所。我在美國度過了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並沉浸於婦女／性別史的研究當中，進而擴及全球／世界史。我的關注焦點集中於近代早期，對於研究全球史和性別史的學者而言，近代早期都是關鍵的時代。上面所述是一些較具體的學術經歷和知識背景，這些脈絡影響了我的觀察和評論。與我學術背景不同的學者，則無疑會注意到其他不同的文獻和議題。

共同的推力，平行的取徑： 兩種修正主義的歷史學研究

首先，婦女／性別史家與全球史家的共同點在於：他們對於學院化的歷史學科都表現出一種修正主義精神(revisionist spirit)。兩邊的學者皆挑戰歷史書寫中，那些或隱或顯的決定因素，這包括：何種類型的歷史曾被講述、並且被認為是真正重要的；歷史知識是如何被組織成研究和教學主題；什麼樣的群體有機會進入那些主宰歷史知識的機構（其角色可能是知識的生產者、教授者，也可能是學習者）。¹ 為了解修正主義式的性別史和全球史的激進程度，這裡我們值得花點時間做些回顧，想想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的起源是怎麼回事。現代的歷史學科形成於一個特殊的時空環境當中，亦即 19 世紀的西歐和美國東部。一開始，在這個學科當中被正式認可的從業者是一群非常特定的人——為國族建構計畫服務的白人男性。當然在這之前，西歐和美國東部一如世界上許多地方，早已有歷史書寫的傳統。以西歐為例，長期以來，人們寫下了編年史、宮廷史、統治者傳記、宗教社群的紀錄，另外還有一些人保存著家中藏書，在這些書中他們跨世代地記錄了各種重大事件，並融入了個人的和政治的觀察。² 隨著歷史學科在 19 世紀的出現，研究主題及咸認的

-
- 1 梅里·威斯納-漢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也有同樣的觀察，參見 Merry Wiesner-Hanks,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8:1 (March 2007), p. 54.
 - 2 對比於 19 世紀出現的新型歷史書寫慣例，這些近代早期的歷史書寫形式使女性相對更廣泛地參與了集體記憶的創造。參見吉安娜·波馬塔(Gianna Pomata)發人深省的文章，Gianna Pomata, "History 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On Reading Some Recent Women's History Textbooks,"

研究方法都被規範的更加明確與狹隘。這種新的「科學化歷史」(scientific history)必須以一手史料為基礎，並在「研討會」(seminar)的環境下被學習。新的、機構化的「科學化歷史」由一個特定的社會團體負責生產，這個社會團體原先只是一小群人，他們同時也認知到自己所進行的歷史工作是服務於民族國家的，如同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所示範的那樣。蘭克除了是這一「科學化歷史」的開創者，也是當時普魯士王國裡一個忠誠於國家的文職人員。

儘管從「科學化歷史」的時代迄於今日，我們所從事的這門專業已有了很大的變化，然而昔日現代歷史學所誕生的背景環境，仍使得歷史書寫的命運蒙上了巨大的陰影。其中有兩種決定性的遺產對於我們的論旨而言最具有顯著意義。首先，新興的專業歷史學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事業，儘管這門學科宣稱自己是在尋找一種普世性的，或與性別無關的歷史真實。如同邦妮·史密斯(Bonnie Smith)所詳細闡述的那樣，過去婦女被禁止參加學術研討會，但研討會正是傳授那些新的、以史料為基礎的「科學化」歷史研究方法之處。與此同時，她們還被阻擋在那些可以最先找到一手史料的檔案館之外。女性仍持續書寫歷史作品，其內容可能是關於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關於宮廷裡的皇后。但由於她們身為女性作家，被排除在新興的、專業化的男性歷史學家範疇之外，她們的書寫價值也隨之被貶低，並被擯棄為業餘的、瑣碎的甚至是虛構的作品。³ 而這種排他性的做法只是

Feminist Studies 19:1 (January 1993), pp. 6-40.

3 史密斯和波馬塔都注意到了這種排斥。相反地，我們可以將 19 世紀

19 世紀歐洲宏大的性別畫界現象裡的一部分。新出現的國家公民(national citizenship)觀念是限定性別的，女性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權利之外，並被限定於母職、婚姻和（理想的）家庭生活中。⁴ 因此，在正式的政治，或者在國家和民族的建構、官僚體系、外交和戰爭等領域當中，女性沒有任何角色。然而，這些領域卻一個接著一個構成了新興的「科學化歷史」底下的研究主題。在這樣的時代格局裡，女性既無法寫作「正史」(History)、更無法創造「正史」。

其次，正如過去歷史學科認定男性史優先於女性史、政治史優先於其他類別的歷史，它也認定白人的歷史優先於非白人的歷史，以及人們所熟知的「西方」優先於所謂的世界「其他地方」。⁵ 歐洲和美國的第一批專業歷史學家僅只聚

女作家創作的一部分小說理解成一種以虛構寫作形式為包裝的社會文化史。舉例來說，哈里特·比徹·史杜威(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是美國除《聖經》外最暢銷的一本書，激起了廢除奴隸制的情緒，而這本小說是立基於史杜威對黑奴的陳述及其「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閱讀。雖然像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這樣的現代評論家譴責該書過於多愁善感與情緒渲染，及其所懷持的基督教道德主義和種族刻板印象，但史杜威的小說至今仍被認為是打開了一扇重要的窗口，讓我們得以一窺 19 世紀美國的種族關係，包括其性別化的面向。見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Hollis Robbins eds., *The Annotated Uncle Tom's Cabi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 4 一個例子，參見 Isabel V. Hull, *Sexuali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ermany, 1700-181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及 Ida Blom Karen Hagemann, and Catherine Hall, eds., *Gendered Nations: Nationalism and Gender Ord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td, 2000).
- 5 Kenneth Pomeranz and Daniel A. Segal: "World History: Departures and Variations,"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2), p. 16.

焦於世界上一小群國家的迅速崛起，這些國家的崛起則肇因於工業革命與帝國宰制兩個因素。歷史學家以一種表彰成功的目的論敘事方法，講述這些國家的故事。在故事當中，這些國家的政治形態似乎是先天優越並且高度進步的。而除了被選定的民族國家之外，當這群歷史學家提到其他的國家或政治形態時，只是把它們當作陪襯，用以突出西方的現代性和優越性。同時代出現的一些更具全面性的世界史書寫是由學院外的歷史學家所完成的，這些作品一如女性的歷史書寫，被視作業餘的歷史而遭到排斥。⁶

總之，制度化的歷史學科在 19 世紀出現的時候，係透過一種雙重排斥來自我定義：一方面是排斥女性，或可以稱作對性別及性別政治的盲目；另一方面，則是將世界排除在新近發明的「西方」之外，或可視為對全球及全球政治的盲目。實際上，這種雙重排斥意味著「西方」的男性被選派為歷史以及歷史書寫的主角。這些排斥被寫入歷史學科的 DNA 之中，使得全球史家以及婦女／性別史家難以在學術機構中立足，或獲得主流歷史學家在智識上的認可。

一直到 1960 年代，美國的世界／全球史與婦女／性別史向學院進軍的漫長征途才取得了重大突破。當時的社會運動不僅徹底改變了政治意識和體制形勢，也為全球史家和婦女／性別史家鋪平了道路。至於針對「西方」以外的世界所展開的學術研究，在二戰後和冷戰時期我們見到的是區域研究的興起。然而，地緣政治的利益在區域研究領域的探掘當中變得深具影響力，也因此，東亞、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研

6 Kenneth Pomeranz and Daniel A. Segal: "World History: Departures and Variations,"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p. 16.

究在其中佔據核心地位。1960 年代的新左派和反戰運動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批判，刺激人們以一種新的視角更仔細地觀照這個世界。以歐洲和美國為中心的歷史課程招致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大，進而促成了學院內體制的改變。教授世界其他地區歷史的同行人數開始增加。1970 年代，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課程出現在美國各個不同大學中，繼而在 1980 年代進入到美國某些州的高中，那也正是世界史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已步上軌道的時代。1983 年，世界史學會(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該單位是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的附屬機構，而 AHA 對於美國的歷史學家而言則是最重要的專業性組織。世界史學會的出現標誌著世界史終於成為一門歷史專業。⁷ 1990 年，該領域的旗艦期刊《世界史期刊》(*Journal of World History*)開始出版。隨後則是 2006 年問世的、具有同等影響力的《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同樣在 1990 年代，許多大學首次設立了世界／全球史領域的研究生學程。到了 1990 年代末，則出現了第一批自我標榜為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著作。

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例子是立足於美國的中國史學者王國斌(Bin Wong)以及彭慕蘭(Ken Pomeranz)的著作。⁸ 這裡，

7 一個簡潔扼要的概述，見 Kenneth Pomeranz and Daniel A. Segal: "World History: Departures and Variations,"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引文在頁 17-19。關於該領域的發展，另一個較長但極好的概述，見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8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我們不可能詳細闡釋兩人的研究當中那些複雜的論點。然而，即使只是為他們的著作做些簡單的摘要，仍可以大致突顯出世界／全球史當中三項決定性的特徵。首先，王國斌與彭慕蘭的著作皆代表了全球史的關注焦點轉向了相對來說仍未經探索的區域（例如王國斌與彭慕蘭所關注的中國），並且超脫了「民族國家」與「西方」，往更寬廣的空間範圍發展。其次，他們的著作示範了如何處理更宏大的時間跨度（這是全球史的標誌性特徵），打破了各地傳統上的歷史分期思考，進一步來到另一個時間的尺度上進行思考。在這個時間尺度當中，歷史的變化是跨／區域性地產生迴響的。⁹最後，兩人的研究整理了比較研究的方法，以及聯結關係的探索，這些作法，都使得歐洲在歷史和歷史書寫當中不再居於中心位置。¹⁰

歐洲的啓蒙運動遺留給西方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一種觀念，即人類歷史是在世俗時間(secular time)當中開展，並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9 以更大的時間範圍來寫作的全球史，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大衛·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的「大歷史」(Big History)取徑，參見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10 早期在世界史範疇中探討比較方法的使用以及聯結關係的重要文章包括：Jerem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3 (June 1996), pp. 749-770. Joseph Fletcher,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 (1985), pp. 37-57. Shmuel N. Eisenstadt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Introduction: Paths to Early Modernities: A Comparative View," *Daedalus* 127:3 (June 1998), pp. 1-18. Sanjay Subrahmanyam, "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3 (July 1997), pp. 735-762.

朝著一個政治資本主義現代性(political capitalist modernity)的終極目標逐步前進。¹¹ 此一框架下，歐洲被視為現代性的起源地，因為歐洲特別早、也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一些性格傾向，比如理性、好奇心、個人主義和自由等等。另一方面，現代性則是從歐洲向外輻射，甚或被分送到世界其他角落（有時這個分送的過程還被看作歐洲「文明使命」的一部分）。在邁向現代性的道路上，歐洲或西方被假定為政治組織和財富生產的領路者，而世界其他地區則不可避免地在政治和經濟發展上落在後頭。¹² 這種世界歷史演變的歐洲中心概念，構成了許多支配性的學術典範之基礎（尤其是韋伯式的現代化理論）。這些典範被用於研究世界其他地區——其結果是，它們關注的那些地區始終無法達到像歐洲那樣的水準，成為所謂真正的現代社會。

王國斌與彭慕蘭的研究闡明了現代化理論的限制，並且削弱了那種假定歐洲必然主宰現代世界的想法。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是一部歐洲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比較研究，在這本書中，歐洲與中國的比較位置是平行的，一如它們各別坐落於歐亞大陸兩端那樣。此研究以西元 1600 年迄今的世界為中心，偶爾涉足更早的時代。王國斌沒有將歐洲的發展經驗視作比較的預

11 關於歷史目的論作為一種思想形態(figure of thought)與思想模式，參見 Henning Trüper, Dipesh Chakrabarty,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Historical Teleologie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Bloomsbury, 2015).

12 關於這樣一種說法，當前最有力道的批判之一，參見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設類別，而是有效地扭轉視角，把中國經驗視為通往現代性的另一種可能而合理的途徑，並以此為度量標準，反過來檢視歐洲的發展經驗。儘管在第一個千禧年結束前，歐洲和中國的政治組織已分別採取了相當不同的形式，但王國斌認為兩地的經濟發展成就沒有顯著的差異。一直到1900年以前，成功與挫折皆反覆發生於這兩個地方。歐洲在工業時代的經濟起飛並非必然，其制度和心態也沒有在本質上更適合於現代性。

那麼，何以歐洲確實在19世紀時發生了經濟崛起呢？這是一個大哉問，也是這樣一個問題意識，驅使彭慕蘭為它的著作取了一個適切的名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經過該書仔細的探查，歐洲的經濟崛起在地理範圍來說是相當侷限的。更恰當地說，它應該被描述為英格蘭的崛起。而如果比較英格蘭與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國內生產毛額、預期壽命、消費模式、市場以及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支持等方面，兩者的差異並不明顯。根據彭慕蘭的說法，英格蘭在19世紀的經濟突破首先應該歸功於以下兩種環境條件：一、可以便捷地獲取煤炭，這是工業革命的主要能源；二、歐洲所需的物品如木材、糖、棉花等可由美洲殖民地外包生產，因而使英格蘭能夠騰出本土的可耕地用於工業建設。第一種環境條件是偶然發生而不是辛苦得來的，至於第二種環境條件則是自近代早期以來便大量役使的非洲奴隸。¹³

綜上，王國斌與彭慕蘭的學術研究如是將歐洲歷史去中

13 Ken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心化，並從所謂「世界其他地方」(rest of the world)的觀點顛覆了關於「西方」(the West)興起的目的論敘事。¹⁴ 偶然的有利條件，而非本質上的能力，賦予 19 世紀「西方」(the Western)社會全球性的經濟優勢。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國家的歷史並未在王國斌與彭慕蘭的敘述中缺席，甚至還顯現出新的意義，這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將「國家」(the nation)的故事嵌入到一個更大的母題中，並展示了民族國家的歷史是如何被跨區、甚至跨洲的（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殖民的）體系所塑造。

全球史一開始即從其內部重新架構民族國家的歷史。相對來說，婦女／性別史自 1960 年代發展之初，乃從國家內部對民族國家這一框架進行批判性的質問，之後才發生了一個更跨國性的轉向。美國的女權運動不滿女性被排除在許多領域之外，這包括高等教育裡的基礎機構、學院學科、以及旨在培養公民參與職業和公共生活的大學課程。國家政治的排斥似乎與知識生產的排斥性政治關係密切。爲了在歷史學科當中矯正這樣的情況，婦女史家（通常是女性）開始針對女性的歷史經驗開設課程、進行研究，並更廣泛地爭取在歷史學科當中成立婦女史研究的子領域，或推動女性研究的學程。隨著婦女史家挖掘出愈來愈多關於女性歷史的經驗證

14 這些作品激發了許多討論以及成果豐碩的來回詰辯，例如：Philip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May 2002), pp. 501-528; 以及彭慕蘭的反駁，見 Ken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 (May 2002), pp. 539-590.

據，這樣一種新的知識立時推翻了現有的解釋架構，因為那種架構源自於男性的經驗，甚至往往只來自一小群男性的經驗。¹⁵ 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瓊·凱莉(Joan Kelly)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女性有文藝復興嗎？」(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並重新討論了文藝復興的定義。「文藝復興」由19世紀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 1818-1897)首先確立。¹⁶ 布克哈特指出，古典學問(classical learning)的復興、日益增長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和新興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顯著特徵。這個時代標誌著與前一個時代(所謂「中世紀」)的斷裂，並迎來了「現代人」(modern man)或現代性本身的誕生。¹⁷ 在這樣的背景下，凱莉描繪了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宮廷女性的生活，證實她們在文化表現方面的機會和社會政治的影響力實際是在下降的。這樣的結論帶領她從反面回答了自己的問題，並從內部顛覆了西方現代性的故事。凱莉的這篇文章如今已成為經典，該文一直是說明

15 該領域發展的概述，以及相關細節的參考文獻，參見 Sonya Rose, *What is Gender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pp. 1-17; Laura Lee Downs, *Writing Gender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nd edition, 2010), pp. 9-42; Merry Wiesner-Hanks, *Gender in History: Global Perspectiv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1), pp. 1-24.

16 Joan Kelly,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Women, History &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19-50. Jakob Burckhardt,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Basel, 1860).

17 布克哈特本身對現代性及其影響並非沒有猶疑。布克哈特對現代性的比喻則在其他時期和領域當中找到出路，參見 Jason Josephson-Storm, *The Myth of Disenchantment: Magic, Modernity,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p. 90-93.

婦女史擁有什麼樣關鍵潛力的一個良好案例。婦女史不僅是讓女性在歷史紀錄中變得可見，更在於以女性經驗為衡量標準，重新評估那些經過仔細探查後被發現只適合一部分人的故事情節（比如在文藝復興的例子當中，這指的是歐洲上層階級的男性）。

1980年代，隨著課程和研究計畫的增加，以及更多文章和書籍的出現，婦女史逐漸演變、發展為性別史，儘管這樣的轉變從來沒有能夠涵蓋一切，同時還伴隨著相當程度的內部辯論。¹⁸ 該領域的許多歷史學家繼續撰寫婦女史，即使其他歷史學家已經完全接受性別史的概念，或在他們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調和了這兩種取徑。到了1980年代末，兩個領域各自出現了一個（在標題上便已明確揭示其概念的）旗艦期刊：1989年的《性別與歷史》(*Gender and History*)和1990年的《婦女史期刊》(*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當然，辯論本身就是一個領域發展到更成熟階段的指標。瓊·史考特(Joan Wallach Scott)的里程碑之作〈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於1986年發表在歷史學的頂尖期刊《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HR*)上，象徵著性別史在主流研究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文是 *AHR* 有史以來閱讀次數和被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¹⁹ 在知識傳播快速數位化的

18 舉例而言，針對史考特的概念，一種充滿挑釁意味的批判，參見 Laura Lee Downs, "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Identity Politics Meets the Postmodern Subjec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2 (October 1993), pp. 414-437.

19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當下，它也是 *AHR* 被下載量最高的一篇文章。因此，毫不意外，史考特這篇綱領性的文章在不同領域和不同的國族歷史學當中（基於它們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政治論辯以及理論取向）產生了歧異的回應和迴響。2008年，*AHR* 在其中一期裡推出了專門的論壇，探討史考特的概念在美國史、拉丁美洲史、東歐史、中世紀歐洲史和中國史等各種研究領域當中被接受的不同情況。²⁰

史考特定義性別作為一個歷史範疇的兩個主要理由，值得在這裡重述一次。正如她在這篇開創性的文章當中所指出的：「定義的核心立基於以下兩個命題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別是構成社會關係的一種要素，而這種社會關係以人們認知的生理性別差異為基礎」。²¹ 這個定義的第一部分，指出了性別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可變性和歷史性。性別並不是一個人類在身體上天生固有且不變的差異（即「人們認知的差異」*perceived differences*），而是附加在身體上的文化和社會意義，從而也形塑了身體的差異。性別規範是由社會所制定的社會關係，男性與女性的性別是在彼此的生理差異中形塑而成。性別的意義因社會地位、種族以及世代差異而迥然有別，它們亦隨著社會和時間不斷演變。

定義的第二部分（「性別是表示權力關係的主要方式」）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December 1986), pp. 1053-1075.

20 Joanne Meyerowitz, Heidi Tinsman, Maria Bucur, Dyan Elliott, Gail Hershtatter, Whang Zheng, Joan W. Scott, "Forum: Revisiting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5 (December 2008), pp. 1344-1430.

21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December 1986), p.1067.

在這裡特別重要，因為它不只將性別置於家庭與親屬領域，更將之置於政府和政治經濟領域的權力關係之核心。性別不僅賦予「女性」和「男性」不同的意義，並且還在被定名為「男性」和「女性」的人群之間建立起等級制度或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性別化的語言總是具有多種意義，並產生多重效果，這使得性別更廣泛地成爲一種組織權力的強大工具。性別是一個核心力場，政治權力在其中並藉此來闡述、展示並合法化自己。史考特的定義借鑒了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後者視語言爲建構（而非反映）社會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史考特將這種對語言的後結構主義理解與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散佈(dispersed)概念相結合。

儘管史考特對政治抱持廣義的傅柯式觀點，但她有許多探討性別之運作方式的具體例證，實際上來自於更狹義的政府或民族國家的政治，在這個取徑裡，性別的運作是從內部去本質化的。在史考特的研究之後，出現了許多性別政治的著作，這些著作呼籲人們注意大規模歷程(large scale process)中內在的排除和等級化機制，藉此使得關於國家形成或民族主義的舊故事有了更複雜的新樣貌。更重要的是，史考特的定義意味性別作爲一種權力機制，即使在沒有女性的領域仍然運作著。更確切的說，女性的缺席本身就是性別作用的一種結果。這點對於全球史來說尤其重要，因為它長期聚焦在男性是主要的、有時甚至是唯一行動者的領域：從貿易擴張、殖民地的征服，到勞動剝削以及帝國統治，等等皆是。同時，世界／全球史學家仍然不習慣探問：何以這些領域的歷史起初便被編寫得充滿陽剛之氣（爲什麼裡面沒有女性？）以及這個現象可以揭示何種更普遍的政治權力運作方

式（仔細研究往往會發現其實有一些女性身處其中；例如在殖民脈絡下，大多數或全部女性可能都是本地人）。至此，便引出了以下這個問題：性別史與全球史這兩個強大的修正主義事業之間，究竟有何種關係？

雖然這兩個領域的歷史學家皆關注傳統敘事的修正，但世界史學者和性別史學者傾向在各自的機構和智識空間 (intellectual spaces) 中工作，而這兩群人之間並沒有太多交集。關於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知識隔離，有篇文章提供了一針見血的衡量方法。該文以一個性別史與一個世界史的旗艦期刊（分別是前文已提過的《婦女史期刊》與《世界史期刊》）為研究對象，針對發表在這兩個刊物上的文章進行統計。2000-2010 年間，《婦女史期刊》總共發表了 150 篇文章，但其中只有 15 篇文章 (10%) 處理到世界／全球史的問題。同一時期，《世界史期刊》則刊登了 160 篇文章，其中只有 8 篇 (5%) 涉及婦女與性別問題。²² 換言之，婦女／性別史的學者極少看到自己領域內的同行書寫世界／全球史，而世界／全球史的學者則鮮少有人認為自己創造的學術成果會與婦女／性別議題相關。

今天，這兩個領域之間已經有更多週期性的活動，意圖開闢更多的溝通與交流管道。2010 年，世界史學會會議的主辦方選擇將「性別」設定為該年度的兩個主題之一。2011 年柏克夏婦女史會議 (Berkshire Women's History Conference) 的主辦方則在其會議公告中表示，他們希望探索一股與新的

22 Merry Wiesner-Hanks, "Crossing Borders in Transnational Gender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6:3 (November 2011), pp. 357-379; 引文在頁 362。

全球史相關連的能量，並徵求跨國主題的論文和討論小組。²³ 不過，當我們再次應用前文提到的衡量方法，把頂尖學術期刊視為這兩個領域之間知識交流的重要橋梁，檢視發表在這些期刊上的文章，就會發現這些努力的效果仍然有限。統計結果顯示：連結起全球史與性別史的文章不但沒有增加，實際上，最近反而有下降的趨勢。在 2011-2019 年間，《婦女史期刊》刊登了 250 篇文章，總數量提高了；然而，世界／全球史主題的文章數量卻仍保持在 15 篇，百分比降低到 6%。《世界史期刊》也顯示出相似的趨勢。我只能查閱 2011 年至 2015 年的卷期，當中一共有 125 篇文章，總數量同樣增加。然而，其中僅有 6 篇明確涉及婦女／性別史，百分比低於 5%(4.8%)。

婦女／性別史以及世界／全球史就像出自同一個源頭（或像是源自對主流歷史的批評之井）的兩條河流，很快就沿著兩條平行的河床向前奔流，並創造了它們各自本身的動力，但也因此難以在兩者之間建立渠道。任何人只要嘗試去編製聯結這兩個領域的課程大綱，即會很快理解整合的困難。²⁴ 以下較概略地整理兩者難以整合的可能原因：世界／全球史大力地強調唯物主義，而婦女／性別史（至少在英美

23 Merry Wiesner-Hanks, "Crossing Borders in Transnational Gender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6:3 (November 2011) p. 362.

24 針對這個問題早期的分析判斷，參見 Judith P. Zinsser, "And Now For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Gender the World History Survey," in Ross E. Dunn ed.,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oston: Bedford, 1999), pp. 476-478. 近期關於世界史課程設計非常有益的指南，參見 Antoinette Burton, *A Primer for Teaching World History: Ten Design Principl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和歐洲的性別史發展脈絡中)則傾向強調文化主義。²⁵ 世界／全球史家傳統上一直關注政治經濟學,他們將國族歷史的範疇(國家、市場、帝國)移置到全球的尺度當中以進行比較,並研究它們之間的聯結。儘管1970年代的婦女史強烈地傾向唯物主義,並從結構人類學和馬克思主義當中汲取養分,然而史考特在1980年代的美國所引領的性別史轉向是人文學界更普遍的「語言轉向」(linguist turn)之表徵,該轉向長期影響了許多研究領域。²⁶ 「語言轉向」基於一種信念,即語言與其說是社會現實和文化意義的如實反映,不如說是創造社會現實和文化意義的工具,因此有必要將語言作為探究或「解構」(deconstruction)的核心主題。性別史家運用文學和文化分析方法,針對許多地方的性別、性、種族和族裔之「差異」(difference)進行了更加細緻的描述,並進一步破壞了早已是婦女史抨擊目標的普世性或主宰性的敘事觀念。²⁷

對差異的關注,和對虛假的普世性之懷疑,使得婦女／性別史家習慣性地質疑任何形式的宏大敘事。世界史無疑是

25 關於這兩個領域分歧的知識軌道,更完整的闡述,參見Ulrike Strasser and Heidi Tinsman, "It's a Man's World? World History Meets History of Masculinity,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for Insta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1 (March 2010), pp. 75-96.

26 Doris Bachmann-Medick, *Cultural Turns: New Orientatio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trans. by Adam Blauhut (Berlin: De Gruyter, 2016), pp.21-32.

27 威斯納-漢克斯提出了相似的關注差異的觀點,並且她還認為這兩個領域很少關注對方發生的事情,對彼此的看法也已經過時了。這樣的錯誤認知,使得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研究者對建立彼此的關係沒有很大的興趣,參見Merry Wiesner-Hanks,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8:1 (March 2007), pp. 54-55.

一種新型的宏大敘事，甚至可以肯定地說是迄今為止最具野心的一種。它使人擔心普世歷史的再次回歸並帶來危害，特別是由於世界史家經常仰賴 1970 年代的社會理論，而這些理論正是性別與性的歷史學者曾經花費大量時間去解構的。不過，這種憂慮有時似乎被誇大了；正如我們看到的，像王國斌和彭慕蘭這樣的全球史家即著手批判性地探問並重寫西方社會理論。然而，當涉及世界史教科書時，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因為教科書總是需要極度的整合、歸納、摘要，而這些做法都可能造成問題重重的直觀理解。茱蒂絲·津瑟(Judith Zinsser)曾指出世界史敘事中存在著她所譴責的「虛假的普世性」(false universals)：²⁸ 諸如人口或社會等抽象概念，看似包含男性與女性之歷史主體，但仔細觀察後可以發現，這些抽象概念只是男性人口的縮略。同時間被忽略的是：女性其實占了世界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即使是那些包含女性的概念，也往往在字裡行間、敘事風格或語言選擇上傳遞出關於性別的錯誤資訊。例如，女性只有在她們是傑出的情況下才會作為個體出現，這種作法實際上是在為另一種觀念背書，即男性的歷史活動是最有意義且最重要的。再加上女性被標記為性別化的個體，而男性則沒有，仿佛他們的性別並不需要被考慮。為自己的奴隸生涯留下敘事性自述的瑪麗·普林斯(Mary Prince, 1788-1833)，被說成是一個女性奴隸或女性作家。²⁹ 與此同時，正如津瑟尖銳地指出：如

28 Judith P. Zinsser, "Women's and Men's World History? Not Yet,"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5:4 (December 2013), pp. 309-318.

29 瑪麗·普林斯的敘事以及關於其他女性的一手材料與資訊可以在「世界史中的女性」(Women in World History)這個資訊豐富的網站中查詢到，網址：<http://chnm.gmu.edu/wwh/>

果讀者讀到「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男性領袖」這樣的句子，可能會大吃一驚。³⁰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使性別成爲世界／全球史研究中一個有效的歷史分析範疇？我們如何在這些研究領域之間建立更長期的聯結？最後一部分，我將畫出三種研究取徑，從性別的角度，爲我們所共同身處的世界，創造新的歷史敘事：突出女性的位置，強調作爲男性的男性，以及檢視大歷史的、大跨距的時間進程當中的性別化面向。

突出女性：獨立的婦女世界史以及世界各地性別規範的比較研究

前文述及的津瑟嚮往著一部徹底性別化的世界史，並敦促婦女／性別史家不斷朝它邁進。她主張嘗試新的普世性世界史敘事，這樣一種敘事能在課堂上平等地對應到男性和女性的多種經驗，雖然同時也有人警告說：這樣的努力將會因爲缺乏合適的教材（特別是教科書）而受到阻礙。³¹ 然而，鑒於婦女／性別史研究的成熟狀態，津瑟建議：是時候撰寫

30 Judith P. Zinsser, "Women's and Men's World History? Not Yet,"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5:4 (December 2013), p. 310.

31 舉例而言，一種不仰賴任何教科書的性別史與世界史課程，參見 Ulrike Strasser and Heidi Tinsman, "Engendering World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91 (Winter 2005), pp. 151-164. 明尼蘇達大學的瑪麗·喬·梅恩斯(Mary Jo Maynes)和安·沃爾特(Ann Walter)也開發並教授了一門課程，該課程以家庭爲中心，探討家庭作爲西元前1萬年至今的歷史制度，並通過這一視角整合性別史。她們根據這樣的取徑編撰了一本教科書，參見 Mary Jo Maynes and Ann Waltner, *The Family: A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獨立的婦女世界史了。

如果通過（占全球總人口 51%的）女性視角來講述世界的歷史，歷史會是什麼樣子呢？自婦女史創立初期以來，人文學研究幾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區都出現豐富的成果。其中許多領域的研究總是涵蓋到下列議題（此外的其他領域亦漸漸如此）：跨邊界的和跨文化的互動、纏結的(entangled)和共有的(shared)歷史，以及混合(mixture)和混雜性(hybridity)。這樣一種（幾可說遍佈世界的）學術研究的存在，可以成爲新的跨區域和跨國敘事的基礎。這些敘事匯集了與世界／全球史典範相關的研究工具和研究主題，例如有關全球不同地區的比較或現象。津瑟爲婦女世界史的寫作提供了「一個非常主觀的清單，其中大約有六個概括的主題性討論取徑」。³² 簡要來說，她提議聚焦在家庭中的女性；女性的勞動；女性共同的生活和活動；女性在政治實體中的角色和身份；宗教、社會和政治對女性身體的控制；離散、遷移或人口的流動。這裡，我們不可能詳細介紹津瑟在每一個大主題底下所述及的子題。無需多說，正在尋找研究主題的學生和讀者若參考津瑟更詳細的清單，定會大有收穫。³³

在這一點上，我們或許還可以從一個非常基礎的面向加以補充：性別（不只是女性的性別）是一個卓越的世界史主題，這個主題極需要進行比較研究，以及追索跨越時空的連結關係。性別的概念確實普遍存在於人類文化中，絕大部分

32 Judith P. Zinsser, "Women's and Men's World History? Not Yet,"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5:4, p. 313.

33 Judith P. Zinsser, "Women's and Men's World History? Not Yet,"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5:4, pp.313-315.

（儘管不是所有）文化都理所當然地認定有男性和女性兩種主要的性別，並透過兩者彼此之間的關係來為這兩個性別下定義。³⁴ 被貼上男性或女性標籤的個體被預期應以某種特定的方式來感受和行事，社會機構和法律體制也致力確保個體將會遵循這些期望。所有的宗教傳統，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儒家思想，都規定了男性和女性所該有的行為，儘管那些管得最多的控制性話語通常都是衝著女性來的。當這些宗教傳播到世界各地時，這些規範性的架構也隨之遷移。³⁵ 性別規範被記錄在較容易取得的材料中，如法律文件、政治命令或宣揚宗教理想和道德準則的作品。由於這些紀錄的本質在不同社會和文化中皆具有可比性，因此可以進行相當直接的比較。同時，除了性別規範本身的普世性，人們一定也會發現這些性別規範在實踐上存在著相當大的歧異。而規範和實踐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特別是當不同的文化彼此接觸，規範和實踐系統交互混雜後所產生的新結果，為全球性別規範的跨文化比較研究提供了更豐富的素材。

強調男性：講述競爭性陽剛氣質及父權動力的世界／ 全球史

如同前述傳統上世界／全球史聚焦在以男性為主要行動者的領域，但卻未考量這些領域的性別化本質或者說未將男性視作男性，而是將男性視為看似無性別的歷史主角。婦

34 詳見 Merry Wiesner-Hanks, *Gender in History: Global Perspectives*.

35 Merry Wiesner-Hanks, *Gender in History: Global Perspectives*, pp.109-136.

女／性別史提供了理解世界歷史過程的不同視角，也就是將這些歷史過程看成是男性以其性別特有的方式去影響與實踐的，並且將世界史敘述為一部陽剛氣質彼此競爭的故事。³⁶ 歷史上，作為一個男性的意義總是在與其他男性的競爭中被塑造而成，此外也與對女性的控制有關。無論在什麼地方，陽剛氣質都是不同社會階級、族裔與年齡的男性之間一個爭奪的群集(contested constellation)。這些陽剛氣質在不同的時空如何表現？男性的身體是如何被理解並藉由有關行為舉止和服裝的規範來加以控制的？新型態的陽剛氣質何時出現？它的出現與新的政治或勞動體系之間有何關聯？或者，不同的陽剛氣質是否塑造了特定地方人們的特質、跨文化的互動或世界歷史中的各種相遇？

舉例而言，耶穌會士的陽剛氣質首先出現於 16 世紀的歐洲，當時正值父權體制日趨嚴格，殖民帝國開始建立。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與之互補又競爭的陽剛氣質，即西班牙征服者。³⁷ 耶穌會士利用歐洲的殖民與商業帝國結構，乘船來到美洲、亞洲、非洲，向當地居民傳教，並試圖向原住民灌輸歐洲——基督教的規範，包括性別和性在內。³⁸

36 關於將世界史敘述為陽剛氣質競爭的故事，一種更詳盡的提議，同時是來自拉丁美洲研究的指導性案例，參見 Ulrike Strasser and Heidi Tinsman, "It's a Man's World? World History Meets History of Masculinity,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for Insta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1(March 2010), pp. 75-96.

37 參考蕾恩·柯挪(R. W. Connell)的早期研究，她識別這種新的陽剛型態在西方的出現，參見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186-191.

38 關於耶穌會士的陽剛氣質與全球史，參見 Ulrike Strasser, *Missionary Me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German Jesuits and Pacific Journeys*

至於在中國，傳教事業本身產生了數量有限的改宗者，其中也包括女性。然而，眾所周知，耶穌會士透過他們的報告，為中國作為一個儒教國家的全球形象之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淡化了佛教在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並將孔子描寫為一個世俗的哲學家，其倫理體系與基督教能夠輕易相容。不過，長期不為人所知的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摒棄佛教卻與儒家精英學者交好，是因為更個人的性別化原因。瑪麗·拉文(Mary Laven)揭示了在中國宮廷陽剛氣質競爭中的男性焦慮和耍手段爭奪，如何影響利瑪竇在中國傳教路線和形態。在利瑪竇改換儒服——象徵其儒家學者的身分認同之前，他曾嘗試過另一種男性服飾。1583年，利瑪竇到達中國後，急於在中國社會取得進展，因此他首先打扮成佛教僧侶。但當他瞭解到許多佛教僧侶其實蓄養著女人，且過著放縱而不道德的生活（而這種生活方式在歐洲已成為新教反僧侶的書寫素材）後，他便結束了第一次的服裝實驗，並開始譴責「荒淫」(dissolute)的佛教僧侶。然而，正如拉文所詳述的，利瑪竇將最嚴厲的抨擊留給了皇宮內的太監。利瑪竇依賴太監群體來接近皇帝。但在中國社會中，這些宦官無法繁衍後代並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使他們的地位飽受爭議。與宦官親近會提醒人們耶穌會士自身的獨身狀態，阻礙他們向中國人傳教。是故，為了成功地應對中國複雜的政治格局，利瑪竇決定與宦官的競爭對手（同時是地位上升中的朝臣）結盟，這群人就是儒教底下的士大夫。隨著利瑪竇開始穿上儒服，他其實是試圖在中國社會，特別是在皇帝面前穿上男性文人氣概的聲望和信譽。這是男性服飾獲得的最高

成就，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³⁹

我們可以將這個例子與一個現代的案例進行比較。克里斯多福·貝里(Christopher Baily)將長時段 19 世紀的地緣政治，與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男性在身體舉止上的根本變化聯繫起來。貝里概述了在 18 世紀末，鄂圖曼帝國和中國是何等強國，那時非洲和太平洋的大片地區仍是歐洲無法觸及的範圍。然而，到了 20 世紀初，歐洲的帝國主義已到達巔峰，並已擴及非洲和太平洋地區，鄂圖曼帝國和中國則衰落了。而變動的地緣政治反映在男性的身體上。在 1780 年代，世界上的男性掌權者穿的是本地特有的服飾：從歐洲的長禮服到中國的儒服，在非洲和太平洋的某些地區則是極有表現力的裸體。不過，到了 1914 年，西式禮帽(top hats)和黑色早禮服外套(black morning coats)已經成爲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男性不可或缺的制服。明治時代的日本公務員必須穿著西服上班，正如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穿著同樣的服裝來表示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與這股服裝變革的浪潮相關的是懷錶的傳播。地方性的時間系統（如 18 世紀的中國和印度），相對於標準化的世界時間變得次要，新興的精英階層則服從於全球同步的文字、商業和政治事務的節奏。⁴⁰ 這也是另一個案例，說明了學術研究如何關注男性身體的研究，包括他們穿

39 Mary Laven, "Jesuits and Eunuchs: Representing Masculinity in Late Ming China,"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3:2 (June 2012), pp. 199-214.

40 Christopher Bai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導言請參考頁 1-21，由男性身體所示範之身體舉止作為一種分析視角，參考頁 12-19。有趣的是，貝里的索引中沒有關於性別的條目，只有女性這個條目。

什麼、如何以及為何行動。這些研究可以闡明世界範圍內地緣政治的變動，與個人生活、男性身分之間的歷史關聯。

書寫大規模歷程的性別化歷史：
帝國、性別邊陲與異族通婚的案例

全球史所描繪的一切大規模歷程，諸如貿易、遷徙、跨文化交流或征服，都是世界上每一個人以他們作為男性或作為女性的獨特身份所經歷的過程，無論他們是直接參與還是不經意地被捲入其中。然而，仍有許多的大規模歷程尚未被擺放在性別的稜鏡下加以檢視。⁴¹ 分析這些歷程的性別化本質，是實現性別化的世界／全球史之第三種途徑。換言之，這種研究取徑結合了兩個方面的關注，分別是創造全球聯結的宏觀歷史現象，以及地方和個體的微觀歷史。同時，這一取徑也結合了認同和主體性的議題，而這些問題必然是性別的問題。

帝國的研究是很好的例子。雖然關於帝國的學術研究不成比例地集中在近代和大英帝國，但在該領域中世界／全球史以及婦女／性別史已逐漸變得愈發交織在一起。⁴² 帝國史

41 也可參考 Merry Wiesner-Hank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Jerry H. Bentley, Sanjay Subrahmanyam and Merry Wiesner-Hanks eds.,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Vol.6: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1400-1800CE, Part I: Found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33-156.

42 參見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eds.,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帝國、性別與性的世界史課程範例，見 Ulrike Strasser and Heidi Tinsman, "Engendering World History," *Radical*

並不是全球史的同義詞，人們應該小心兩者之間的落差。儘管如此，帝國研究為性別化的全球史提供一個入口，因為帝國一直是世界史中創造聯結的主要動力之一，它促使全球不同的地區彼此接觸和衝突，造成人和文化的遷徙與融合，同時還以地方相對於全球的衡量尺度劃定了新的邊界。在 1500 年以前，東西半球分別發展，並各自透過帝國的建設整合成一體，如蒙古帝國在東半球促進歐亞大陸的融合；阿茲提克帝國(Aztecs)和印加帝國(Incas)征服並吸納了美洲許多的民族和地區。1500 年以後，歐洲海外的帝國建設導致了大規模的遷徙，並使東、西半球發生持續的接觸和交流，這也迎來了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以及歐洲在 19 世紀的霸權，儘管如前所述，後者是由於多方面的全球局勢所促成。

縱觀歷史，帝國的建設者都在尋求以更符合帝國和新統治菁英需求的替代方案來取代現有的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涉及性別和性的安排。凱西·布朗(Kathy Brown)針對殖民和帝國的脈絡創造了「性別邊陲」(gender frontier)一詞，以描述兩種文化上各自特異的系統在歷史上所發生的碰撞，藉此理解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如何在這當中展開。也是在這樣的社會生活當中，性別化認同、象徵和實踐發生了徹底的轉變。⁴³ 世界各地的帝國建設者也利用性別作為一種意

History Review 91 (Winter 2005), pp. 151-164. 其他關於世界史與婦女史交織的例子，見 Merry Wiesner-Hanks, "Crossing Borders in Transnational Gender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6:3 (November 2011), pp. 357-379.

43 Kathleen M. Brown, "Gender Frontiers and Early Encounters," in Ellen Hartigan-O'Connor and Lisa G. Matter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9-41.

識形態和隱喻性的語言（用史考特的話說，性別是權力的意符 signifier），來解釋和合理化其征服、支配和特定形式的帝國統治等等行爲。女性的身體，特別是女性關於性的行爲，在世界各地的帝國脈絡下，一直是人們在制定規範時的矚目焦點。⁴⁴

針對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已有許多出色的婦女／性別研究闡明，西班牙男性和原住民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對於征服本身的重要性。由於印加和阿茲提克帝國由許多被征服的民族組成，這些被征服的安地斯和墨西哥民族對他們的統治者有很大的不滿。墨西哥人的部落中便有一些重要的部族加入西班牙人的行列。至於印加的情況，則是帝國中的一整個派系試圖推翻另一個派系，並暫時加入了西班牙人的陣營。歷史學家們同意，這些聯盟對西班牙人的勝利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儘管關於這段歷史有一個由征服者自己創造的恆久神話，即西班牙人在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z, 1485-1547)和法蘭西斯克·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 1471 or 1476-1541)的領導下，只用了數百人就征服了這些強大的帝國。然而在現實中，西班牙人與許多原住民支持者結盟且並肩戰鬥，其中包括了許多女性。⁴⁵

舉例而言，科爾特斯不可或缺的盟友即是今天被稱爲瑪琳切(La Malinche)的原住民女性，當時在納瓦特爾語中她被稱爲 Malintzin、西班牙語則是 doña Marina。由於普遍流行

44 巴蘭亭和伯頓在《接觸中的身體》(*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一書的導言也指出了這一點。

45 Matthew Restall, *Seven Myths of the Spanish Conqu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的印第安人認同和民族主義的現代概念，她經常被時代錯置地譴責為「其種族的性叛徒」(sexual traitor to her race)。瑪琳切來自阿茲提克人先前征服的許多部族之一，她被他們賣給馬雅人做奴隸，馬雅人又把她交給了科爾特斯。在整個征服過程中，瑪琳切是科爾特斯的翻譯和談判代表，而後成為他的情婦，並且和科爾特斯生了兒子。後來，科爾特斯把她嫁給了另一個征服者胡安·德·哈拉米略(Juan de Jaramillo)，兩人也生了一個孩子。⁴⁶ 瑪琳切的生命史象徵的是一個關於性別的支配與混合的歷史過程，而這個過程從一開始就參與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當中。

另外，科爾特斯的副手皮薩羅對於印加的征服，則涉及他與印加公主安吉麗娜·尤潘基·科亞(Doña Angelina Yupanqui Coya)的關係，他們之間也有一個孩子。在印加菁英眼中，這段關係賦予了皮薩羅合法性，也使他與印加貴族之間產生聯結。同時，這段關係也象徵著西班牙對印加的父權統治。再者，皮薩羅與安吉麗娜的結合使他得以控制新的資源，即土地和人力。安吉麗娜身為印加公主，她擁有傳統上的權利，可以分配土地特權給家族內的其他女性。不過在西班牙的統治下，男性在財產上被賦予比女性還要更多的決定權。因此，皮薩羅可以合法地干預安吉麗娜關於土地方面的決定，同時還可以影響哪些部族能夠獲得獎勵，誰的土地被奪走。然而，安吉麗娜在這之中並不全然是受害者。西班牙殖民者授予印加王室成員繼承權，因此他們可以宣稱祖先輩的土地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原先在印加人的統治下，像安

46 關於瑪琳切的一手材料與教學單元，可以在以下的網址中檢索：
<http://chnm.gmu.edu/wwh/>

吉麗娜這樣的公主可以決定哪些女性有權利使用哪些土地。不過，根據西班牙人的私有財產觀念，安吉麗娜可以主張她此前「監管」過的所有土地，現在都是她自己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安吉麗娜很樂於參與土地掠奪，剝奪安地斯平民女性的公有土地。⁴⁷ 在這裡我們看到，征服在不同社會階級的女性之間造成了關係的損害，突出了性別和階級之間的關聯。

有趣的是，皮薩羅最後並沒有娶安吉麗娜，他的妻子是一位西班牙貴族後裔。這與科爾特斯沒有娶瑪琳切，卻也選擇了一位西班牙女性的原因相同。對這兩個男人而言，與西班牙貴族之間的婚姻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如此他們才可以將自己與西班牙強大的政治同盟聯繫起來。並且，鑒於他們非貴族的出身，聯姻可以正當化他們作為統治菁英一員的身分。這個例子，凸顯了性別、階級和種族之間的關聯。那麼，安吉麗娜又發生了什麼事呢？皮薩羅把安吉麗娜「贈給」了一位朋友，他名叫胡安·德·貝坦索斯(Juan de Betanzos)，是一位傑出的西班牙學者，他們倆人後來正式結婚了。⁴⁸

西班牙的美洲殖民過程中，其重要軍事人物與印加和阿茲提克貴族（以及來自同盟部落的貴族）之間的聯姻屢見不鮮。西班牙男性菁英認為婚姻的重要性在於提供一種正當性，使他們能夠要求帝國的戰利品。殖民者推行的新婚姻法

47 關於印加帝國興衰史中的性別問題，經典且至今未被超越的研究，參見 Irene Silverblatt, *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15-117.

48 Susan Migden Socolow, *The Women of Colonial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15), pp. 37-39.

意味著最大份額的戰利品最終將落入男性手中。這些法律強調男性在法庭上代表女性，並且對女性如何使用財產的決定擁有否決權。⁴⁹ 與原住民的通婚和性結盟成爲殖民計畫的存續關鍵，儘管西班牙的「純血」(pure blood)概念反對這種做法，但如果沒有與原住民通婚、融混，全爲男性的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發起的計畫將會很快夭折。

如同我們看到西班牙帝國在美洲的這個例子，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了婦女和性別在帝國歷史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但距離我們能夠以一種精細的全球史研究取徑來處理這樣的主題，從而產生性別化的世界史，目前我們只能說是已踏出了一小步。在帝國架構之間進行比較，並探查其間的聯結，是目前這種帝國史研究的合理延伸。⁵⁰

朝著這個方向，蘇珊·阿穆生(Susan Amussen)和艾萊森·波斯卡(Allyson Poska)比較性地檢視了整個大西洋世界裡的不同帝國和社會，並且分析工作、家庭和性在這些地方都是如何被協商。⁵¹ 他們全景式的分析顯示，即使來自不同

49 一個例子，參見 Irene Silverblatt, *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 Patricia Seed, *To Love, Honor, and Obey in Colonial Mexico: Conflicts over Marriage Choice, 1574–182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50 巴蘭亭和伯頓提出，對身體的關注可以凸顯世界史中的婦女和性別，但從他們所編輯的書中所收錄的論文來看，卻不太能夠看到這點。這些文章都是在不同的帝國架構內進行討論，各篇文章僅是被簡單地並置在一起。我們如何完成從帝國史到透過性別化的身體之視角書寫世界／全球史的飛躍？參見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Introduction: Bodies, Empires, and World Histories,” in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eds.,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pp. 1-14; 特別是頁 4。

51 Susan D. Amussen and Allyson M. Poska, “Restoring Miranda: Gender

殖民帝國的歐洲人向整個大西洋世界輸出了一套一致性相當驚人的父權制性別和性規範，但卻很少能夠成功地將其根本觀念植入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的腦海中，因為他們有自己關於性別和性的觀念和實踐方式。原住民在挫敗歐洲人的計劃，以及共同創造大西洋世界這兩件事情上，展現了獨創性和能動性。阿穆生和波斯卡總結道：「因此，對性別問題的關注使我們能夠擺脫歐洲主宰的過度簡化模式，轉而為大西洋的歷史建立一個更複雜細緻且更具包容性的理論架構」。⁵²雖然阿穆生和波斯卡的研究仍侷限於大西洋的歷史，並仍以歐洲的帝國為出發點，但他們跨帝國的比較分析肯定可以適用於檢視全球各種慣用及非慣用的地理群集。

就全球性的比較而言，梅里·威斯納－漢克斯(Merry Wiesner-Hanks)正在進行一個關於世界史上「通婚」(intermarriage)規範和實踐與帝國建設的大型比較研究。在威斯納－漢克斯的語境中，「通婚」指的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面向廣泛的性關係，從短期的私通和同居，到近似婚姻的關係和官方許可的婚姻都包含在內。在某些帝國和殖民的情境下，「通婚」受到官方鼓勵，用以確保權力、施加控制，並傳播新的規範和實踐。然而在其他地方，「通婚」則受到阻撓，甚至被當局禁止並積極壓制。對「通婚」的管理往往因應殖民和帝國治理需求的變動而與時俱進。威斯納－漢克斯已在先前的文章中舉出種種不同的例子，概述了「通婚」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Patriarchy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7:3 (November 2012), pp. 343-362.

52 Susan D. Amussen and Allyson M. Poska, “Restoring Miranda: Gender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Patriarchy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7:3 (November 2012), p.362。

與帝國建設之間的關聯，然而，其中最成熟的例子源自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文獻。⁵³

有鑒於此，本文最後我想討論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關於臺灣的學術研究，它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世界史上另一個並非起源於西方的龐大帝國，並關注其性別面向。鄧津華已揭示，性別論述在清帝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點特別體現在 1683 年的併吞臺灣，以及時人如何將中國重塑為一個多民族、地理上多元分歧的帝國。⁵⁴ 中國的旅行和殖民書寫重點描寫了臺灣女性為部落首領、招贅婚、母系繼承以及男女往來自由等傳統，藉以塑造臺灣島及其居民「野蠻的」(barbarous)形象，性別倒錯的比喻則是用來動員並正當化他們征服的行動。舉例而言，在母系社會中的原住民男性，被塑造為女性化且虛弱的，換言之，他們被視為低人一等且易於控制的。同時，原住民女性被描述為縱欲的、容易被漢人男性利用的。藉此，清廷有效地將殖民和性的征服收

53 關於不同的歷史例證，參見 Merry Wiesner-Hanks, "Crossing Borders in Transnational Gender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6:3 (November 2011), pp. 370-374; "Gender and Sexuality," 139-142; 關於性別與性的範疇批判性的反思，其經常被應用到對西方學術的反省中，參見 Afsaneh Najmabadi, "Beyond the Americas: Are Gender and Sexuality Useful Categories of Analysi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8:1 (March 2006), pp. 11-21.

54 Emma Jinhua Teng, "An Island of Women: Gender in Qing Travel Writing About Taiwan," in Tony Ballantyne and Antoinette Burton eds.,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8-53. 另見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納到一個陽剛的計畫當中。⁵⁵ 這樣一來，征服臺灣的誘惑在於馴服島上那些性感的女性，以及引入適當的儒家父權性別規範至一個仍需教化的「野蠻」島嶼。如同一句老生常談：「番人重女輕男」。⁵⁶

這種殖民的想像助長了原住民女性與漢人男性的通婚。此外，人口不平衡也是一個原因，因為漢人男性在島上的人口遠超過漢人女性。這種通婚日漸頻繁，並獲得社會的認可。作為父權制下的婚姻，這些事例反映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等級制度。雖然一部分殖民官員將這種通婚標榜為文化同化的一種手段，但另一些人則擔心當地女性與外來男性的結合可能會引起不同族群間的衝突。1737年，在一場地方叛亂後，官方禁止漢人男性與原住民女性通婚。⁵⁷ 相比之下，漢人女性與原住民男性的通婚則顯得非常罕見，一直到晚清才出現。但這類故事同樣也可以用來強化所謂的中國人的優越性和臺灣人的「野蠻」(savagery)。例如，漢人妓女寶珠的虛構故事，據說她成為了一個穿上中國貴族服飾的女性部落首領。⁵⁸

鄧津華的分析應用了史考特式的性別作為「表示權力關

55 Emma Jinhua Teng, "An Island of Women: Gender in Qing Travel Writing About Taiwan," in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pp. 42-47.

56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p. 173.

57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pp.176, 186, 187.

58 Emma Jinhua Teng, "An Island of Women: Gender in Qing Travel Writing About Taiwan," in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pp. 47-49.

係的主要方式」之理解，並且她的發現顯然與歐洲帝國的後殖民分析產生了共鳴。然而，在另一次更使人聯想到全球史的嘗試當中，鄧津華藉由她的敘述方式將歐洲去中心化。在文章當中，她同時強調了清朝的帝國建設以及歐洲殖民和帝國事業之間共同點和差異。「處女地」這樣一種比喻的使用和滲透，出現在歐洲人針對美洲和非洲的論述當中，但在清帝國的故事裡卻無法得見。⁵⁹ 相反地，清朝對臺灣的帝國論述，是奠基在長期以來的中國傳統（可上溯到唐朝）對於特定區域的刻板印象。這個傳統將南方邊境轉譯為女性化、潮濕、慵懶、感性的，而北方邊疆則被定型為乾燥、粗獷、尚武、陽剛的。⁶⁰ 清朝性別化的帝國論述以及相關的實踐可能與其西方的對應體相互共鳴，但它們無疑不屬於西方，並且早在這個滿人王朝成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這些性別論述經過幾個世紀的演化，聯結起廣闊的空間範圍，也驅使了清朝統治下臺灣新性別體系的出現。去歐洲中心化的全球史視野，使這些性別化的宏觀歷史歷程成為故事的焦點。

以上關於性別化世界史的實例遠非一個詳盡無遺的清單。最重要的是，本文試圖提供思想的給養，為進一步的探索提供和有用的出發點。我希望上述的例子至少足以闡明婦女／性別史（按照凱莉和史考特的方式）與世界／全球史（按照彭慕蘭和王國斌的方式）之間存在著多麼肥沃的研究土

59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pp. 174-175.

60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p.176. 另見 Teng, "An Island of Women: Gender in Qing Travel Writing About Taiwan," in *Bodies in Contact: Rethinking Colonial Encounters in World History*, p. 41, pp. 45-46.

壤。毫無疑問，在我們共有的這個珍貴的地球上，仍有許多關於男性與女性的共同過去，有待發掘與書寫。